

恩賜之手

家務事

是“糖果”的聲音，很近，很急，把我從熟睡中叫醒，那時是凌晨兩點，「本，本，快點醒來！」我把頭埋入枕頭裏，那天很累，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整天我參加「為健康而跑」的活動，是我們教會辦的。有1公里，5公里，10公里組。我和其他的醫生很快的為參加者檢查身體，另外也有專家為他們解說如何活得更健康，跑得更健康。

“糖果”懷孕已到了最後一個月，她參加1公里組，但是用走的。她用肘推我「我的子宮已開始收縮！」我勉強睜開睡眠，「多久一次？」「兩分鐘」她的話很快就鑽入我腦海中「趕快穿衣服！」我一面下命令，一面從床上躍起來。我們得開半小時的車子，才到了約翰霍布金斯學院。出生在澳洲的老大，經過八小時陣痛才出生，我們想這個應該比較快。

「陣痛才剛開始」她說，腳踩到床下，由

床上爬了起來，才走一半就停了下來，「本，陣痛次數越來越快了！」她的聲音聽起來平板，好像在講天氣。

我不記得自己回答了什麼，但很鎮靜有條不紊的穿衣服「我想小孩要出來了！」

“糖果”說「就是現在了！」「你確定嗎？」我跳了起來，抓住她的肩膀扶她回床上。我可以看見小孩的頭開始頂出來。她安靜的躺下來，用力的推擠，並未感到特別興奮。「糖果」對生孩子好像很熟，熟到好像每隔一個月就生一次似的。好在我有接生的經驗。

不到幾分鐘，我就抓到嬰孩了，「是男的」我說：「糖果」笑笑，但子宮仍收縮著，我一面等等胎盤出來，一面對母親大叫「媽，拿毛巾來，打電話給G11」事後我才意識到，我的聲音是否也像在醫院裏，么喝著「加四級」的緊急狀況。

胎盤出來後，我說「得有東西剪斷臍帶！」我一直想著怎麼夾住臍帶，但不知怎麼做。

“糖果”沒有回答，從床上爬起來，走到浴室帶回三個大髮夾。我把它別在臍帶上，這時醫護人員也到了，把「糖果」還有剛出世的兒子——斑傑明送入當地的醫院。

事後我朋友問我「你有沒有收接生費啊？」

「太忙了！」我不下一百次的告訴自己，「我得改變改變！」是回聲，由牆壁來的，以前就重覆過好幾次的，這次我知道我得改變。

就像那些在約翰霍布金斯學院的人一樣，我面臨了兩難的局面。我的腦神經外科手術事業正蓬勃發展，在教學醫院做事要對病人付出很多時間。「我從那裏抽時間來陪我的家人？」我自問道。

不巧的是，腦神經外科是個不好預測的一行，拿不準什麼時候問題會來，有時間問題很複雜，需要投資很多時間，就算只是自己開業，仍有不順的時候。我開始衡量什麼該優先做，是實驗室的研究工作，寫報告，準備上課的資料，參予研究計劃？還是最近我常參予鼓勵年輕人所做的演講？每天每週的時間都不夠用，表示若我不小心，生活會出問題。

我的工作程序表，對別人的承諾，價值觀，還有那些是可刪減的，這些我想了好幾天。我所從事的都很喜歡，但不可能全部都做。首先我想到我的第一優先，是我家庭，我能辦得到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做一個好丈夫，好父親，

我把週末留給了家人。

其次，我的醫療事業不能失去。我得成為最好的腦神經外科醫生，並把自己奉獻給病人。第三我要成為年輕人的楷模。

雖然決定了，但做起來可不容易，我得善用時間，放棄一些我喜歡的，甚至放棄一些有助益我事業的東西。例如我喜歡多在醫學界發表文獻與大家分享我所學的，並促進更密集的研究工作。對公眾演講很吸引我，且在公共集會演講對我有源源不斷的機會，雖然這些有助於我也快速爬昇，但不能樣樣都做。好在，這些事情雖然都有機會，但並沒有我想像的。那麼多，我們可安排時間來處理。

此外得勻出時間，給我所隸屬的教會。目前我是教會的長老，也是「健康活動」的負責人。我得負責特別節目，連絡教會內其他的醫護人員，比如說，我們贊助像馬拉松那樣的活動，我幫忙連絡事宜，組織醫護人員。我們的教派很強調健康，所以在集會時特別倡導注意健康的二份雜誌「有活力的生活」及「健康」。

我還教導成人安息日的課，討論日常生活與基督教的關係。

減輕工作的第一步在一九八五年開始了。我們工作太忙，只好再多請個小兒神經科醫生，這名醫生解除了一點我的工作負擔。能多雇人員是約翰霍布金斯學院的一大進步。自從上個世紀以來，小兒神經科一直是個一人獨撐的

局面。即使今天亦很少有研究機構雇用兩名員工的。在約翰霍布金斯學院，我們討論聘了人，因為我們病例很多，不可能縮減。

但是新進來的工作人員沒有解決我的困難。一九八八年我意識到不論多努力的工作，就算在醫院工作到半夜，永遠都沒有辦法把工作做完。我做了個重大的決定——當然是在神的幫助下。我決定每晚七點鐘離開醫院。最遲也不超過八點。如此我可以在小孩上床前與他們見面。

「我的工作沒有辦法做完！」我對「糖果」說，她讓我沒有內顧之憂「好像每次總有那麼一點沒做完」我在七點離開醫院與十一點開沒什麼兩樣！——一直維持那樣的作息，大概在七點半下班，十二個小時之後再回去上班，醫生每天工作十一至十二個小時非常合理，但十四到十七個小時就太不合理了。

演講機會越來越多，若是要到外地去，我就順便把家人帶著，但小孩入學後情形得改變。目前若有人邀請我演講，我會順便問問我的家人食宿及交通費是否包含在內。

我們希望母親來同住，如此「糖果」與我如到外地旅行時，小孩可由母親照顧。像我這麼忙碌，許多人都要來分我的時間，我與「糖果」獨處的機會非常重要。要不是「糖果」給我支持，我沒有今日的成功。

結婚前我告訴「糖果」她可能沒辦法常常看到我。「我很愛妳，可是我的志願是醫生，

表示我將來會很忙，若妳認為這樣的日子妳可以接受，那麼我們就結婚，若妳不能接受，而我們結婚，那便是一樁錯誤的決定！」

「我想我可以接受！」

她說我好像很自私？我是不是因理想而有點辜負了那個將成為我太太的女人？或許答案都是肯定的，但這也是現實使然。「糖果」對於我長時間的工作，搭配的很好，或許因為她很自信，有安全感才能讓我這麼的無後顧之憂，也因此我對外來的要求，應付的很好。

當實習醫生及初級住院醫生時每週工作百至一百廿小時，顯然「糖果」根本就見不到我的面。我會打電話給她，如果她有空，會帶東西過來給我吃。吃完東西後，有點時間與她在一塊，然後她回家。

那段期間，「糖果」決定重回學校，她說「本，每天晚上我一個人在家，我想到外頭做點什麼！」「糖果」精力充沛，而且，得善用時間，她在一個教會負責詩班，又在另一個教會組織了一個樂器演奏隊。在澳洲的那年，她也曾經這樣開始了一個詩班和一個樂器隊。

我們共有三個小孩，勞易斯在一九八六年12月21日出生，湊成我們一家五口。我成長過程中沒有父親，我不要我的兒子們也沒有父親。讓我的兒子們認識我非常重要，我不要他們只在剪貼簿，雜誌或電視上看到我。

我的妻子，兒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份。